

敦煌 P.3451 残卷篇名考

王伟琴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关于 P.3451 残卷的篇名,1937 年孙楷第先生在《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拟其名为《张淮深变文》。之后,王重民先生的《敦煌变文集》、潘重归先生编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项楚先生《敦煌变文选注》及其增订本、黄征先生、张涌泉先生校的《敦煌变文校注》等都沿用此名称。笔者在对 P.3451 残卷歌颂对象考证的基础上认为 P.3451 残卷的篇名似应为《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

关键词:P.3451 残卷;篇名

敦煌写卷 P.3451 首尾皆残。关于 P.3451 残卷的篇名,1937 年孙楷第先生在《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中拟其名为《张淮深变文》。之后,王重民等先生编的《敦煌变文集》、潘重归先生编的《敦煌变文集新书》、项楚先生著的《敦煌变文选注》及其增订本、黄征先生、张涌泉先生校的《敦煌变文校注》等都沿用此名称。

孙先生认为 P.3451 残卷拟名的依据是认为变文中的主人公——“尚书”指张淮深,笔者认为:写卷开始至“□□歌乐却东□”中的“尚书”指张议潮,“自从司徒归阙后……退浑小

丑□□□”这几首七言绝句中的“尚书”指张淮深(此部分内容的歌颂对象,目前研究者无异议,下文不再作考证)。歌颂张议潮的文字曾经先于歌颂张淮深的文字而独立存在,P.3451 残卷改动前,它被拟名为《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显然更合适;而经过改写者的改动和添加之后,P.3451 残卷的篇名仍应为《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

P.3451 残卷中的“尚书”为张议潮的理由如下:

第一,从受旌节与被封为尚书同时这一角度看,P.3451 残卷中的“尚书”为张议潮而不为张淮深。

张议潮受旌节与被封为尚书是同时的。《唐会要》第七十一卷沙州条下载:“天宝末,陷西戎。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议潮遣兄义潭,将天宝陇西道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至十一月,除义潮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充归义节度、河沙甘肃伊西等十一州管内观察使,仍许于京中置邸舍。”^①《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中“使送河西旌节,赏赉功勋,慰谕边庭收复之事,受兵部尚书万户侯”^②关于送旌节与封尚书同时的记载与《唐会要》相同,碑中所载此两事同时应该不误。碑中不准确之处在于把张议潮受节度旌节事提前到

态。“游心”重在精神,对心灵的解放,正是在对心灵的解放中实现了对生命的拯救。庄子把心灵的自由看得比任何一切东西都更主要,心灵之自由与宁静,是庄子追求的精神生活。

四、养形

《庄子》中有《养生主》专篇讲“养生”的具体内容。《养生主》强调精神生命的重要性。我们上面论述“守神”,“安命”,“游心”就是庄子护养生命的表现,但庄子的“养生”思想并不局限于“养神”,还包括养形——对外在生命的护养。

庄子认为,人的生命是由“神”和“形”内外两部分组成的,《庄子》一书中一般都将“神”和“形”相提并论,如:劳君之神与形。((《徐无鬼》);苦心劳形,以危其身。((《渔父》);形劳而不休则弊,精用而不可已则劳,劳则竭。((《刻意》);“神”和“形”两者,在庄子的思想中所担当的角色并不是完全平等的,有主次的分别。庄子认为神比形重要,但重视精神保养,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对“形”的养护。庄子说:“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达生》)有些人奉养丰厚,却精神萎缩;有些人形体完整,却生命干枯。世人终身服役,把全部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口体之养的满足与享乐上,这些人财货有余而精神空寂。庄子认为,整个生命活动应包括养神和养形,理想的人生是“形全精复”,“形”,“神”两者都不可偏废。《达生》篇还有一段谈

刺性的对话,说:“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不幸遇饿虎,饿虎杀而食之。有弘毅者,高门悬薄,无不趋也,行年四十而有内热之病以死。豹养其内而虎食其外,毅养其外而病攻其内,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后者也。”这个故事意在说明人生如若只知养形,便精神荒疏;如若只知养神,便精神枯焦。所以养生要神形内外兼修,只注重任何一方面都是很危险的。

总之,庄子的养生思想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可以说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今天仍值得我们重视。

参考文献:

- [1]王博:《庄子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 3 月第 1 版。
- [2]吕锡琛:《道家与民族性格》,湖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 6 月第 1 版。
- [3]杨胜良:《道家与中国思想史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 年 8 月第 1 版。
- [4]阮忠:《庄子创作论》,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 年 10 月第 1 版。
- [5]崔大华:《道家与中国文化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了“大中二年”，且称封的官职为“兵部尚书”。张议潮其时所封官职应为“吏部尚书”，除《唐会要》的记载外，其还见于P.2854《行城文》：“我河西节度吏部尚书。”^③至于碑中提前张议潮受旌节的时间和改封官职为“兵部尚书”的做法，笔者认为这应是其作者有意而为的，因为这样提前了唐中央对张议潮的封赏时间，提高了对其封赏的职位，从而就提前了其被唐中央认可的时间，拔高了其政治地位。

荣新江先生在日本有邻馆藏见一件敦煌文书：“旌节：文德元年（888）十月十五日午时入沙州，押节大夫宋光庭，副使朔方押牙康元诚，上下廿人。十月十九日中馆设后，廿日送。”^④张淮深在受旌节时，并没有说到封尚书的称号。《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中关于张淮深“加授户部尚书，充河西节度”的说法笔者以为可能不符合历史真实。因为此碑立于中和二年（882）^⑤，而张淮深受旌节却在888年。

第二，从变文中皇帝赦免回鹘的理由可以推知故事发生在归义军初期。

变文中唐朝皇帝就俘获的回鹘有这样一段话：“□□□□表奏，获捷匈奴千余人，繫于囹圄。朕念□□□□旧懿，衰日曾效赤诚；今以子孙流落□□河西，不能坚守盟盟，信任诸下，辄此猖狂。朕闻往古，义不伐乱，匈奴今岂（其）谓矣！”他对回鹘的裁决是“因而厚遇之”。唐朝皇帝在说回鹘的过去与现在时，没有说回鹘在“效赤诚”与现在流落河西之间还有别的情况，皇帝这样的说法只能出现在流落河西的回鹘初次被张议潮俘获之时。如果这是流落河西的回鹘第二次、第三次被俘获，可能皇帝就不会这样说了。

第三，P.3451残卷中第一次击败回鹘的“尚书”是张议潮，第一次战斗发生的时间是850年，战斗中被击败的回鹘是西州回鹘。因为变文中后一次战斗的回鹘与前一次是同一支，所以，我们只需要研究清楚第一次击败回鹘的事情就可以了。

变文中回鹘被俘的时间和“尚书”被封的时间可以为判断“尚书”为谁提供依据。回鹘第一次被俘是在“寒霜”的季节，可知回鹘被击败是在冬天。“尚书”被封的时间是“白藏之首”，“秋为白藏”^⑥，可知“尚书”被封的时间在初秋。由此推知回鹘被俘是在“尚书”被封的前一年。张议潮的情况与此恰好相符：他被封为尚书和节度使是在851年^⑦，其前一年850年他击败过回鹘。因此，笔者认为P.3451残卷中的“尚书”指张议潮。

就P.3451残卷的篇名问题，笔者认为《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这一名称可能更接近写卷开始至“□□歌乐却东□”这篇曾经独立存在过的歌颂张议潮的变文篇名的原貌¹⁵；补抄上“自从司徒归阙后……退浑小丑□□□”这几首七言绝句后，整个写卷的风貌发生了变化，但依然沿用这一名称。理由有三：

第一，变文的原名中肯定不会出现张议潮、张淮深的名字。P.3451残卷是演唱当代历史事件、歌颂当代英雄人物的变文，主人公是身在河西最高位置的节度使，所以，当时变文的名称中肯定不会出现张议潮、张淮深的姓名。以当时文章

的题目为例不难看出这一点，如《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S.6161 + S.3329 + S.11564 + S.6973 + P.2762）、《谨上河西道节度公德政及祥瑞五更转兼十二时共一十七首并序》（P.3554v）、《（唐故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司徒南阳张府君墓志铭）》（P.2913）、《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P.3608）、《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P.4640）、《先代小吴和尚赞》（P.4640）、《金光明寺索法律迦真赞并序》（P.4660）等。

第二，P.3451残卷的补加者在歌颂张议潮的变文之后加歌颂张淮深的诗句的做法，可以为我们推测写卷开始至“□□歌乐却东□”这篇原来独立存在的变文的题目提供线索。

P.3451残卷的补写者在和前文内容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于变文后能加一段歌颂另外一位人物的诗句情况，说明其加的内容肯定与前文在某方面是有一致性的。笔者以为，这个一致性应该就体现在后加上的主人公称“尚书”，P.3451残卷在改动后，添加的内容依然涵盖在原来变文的篇名之下这一点上。这个添加上的内容与前文题目《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是照应的，是一致的，这也恰是补写者能在文后补加张淮深业绩的原因。

事实上，补加者根据时代的变化加上张淮深英雄事迹的写法是我国古代传统传记文学中常用的方法，这种在同一篇中以一人为主兼及多个家族人物的文章在唐河西地区也很多，如《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P.4640）、《大唐陇西李氏莫高窟修功德记》（P.3608）、《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S.6161 + S.3329 + S.11564 + S.6973 + P.2762）等。这类文体的篇名特征是概括性强，《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这一题目具备这一特征。

第三，分析归义军时代流传下来的碑、铭、赞、变文、传等作品的题目，官职、姓氏和文体名称是其中的要素。因此，根据这一规律拟定的《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这一名称应该接近写卷开始至“□□歌乐却东□”这篇曾经独立存在过的歌颂张议潮的变文篇名的原貌。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P.3451残卷的篇名应为《河西节度使张尚书变文》。

参考文献：

- ①（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502页。
- ② 荣新江著《归义军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401页。
- ③ 《归义军史研究》，第65页。荣新江先生推测其创作的年代“应在大中及其后不久”。
- ④ 《归义军史研究》，第191页。
- ⑤ 《归义军史研究》，第407页。
- ⑥ 胡奇光、方环海撰《尔雅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页。
- ⑦（宋）王溥撰《唐会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新1版，第1502页。